

目 录

一、秭归民生工厂始末.....

胡立珍 陈明龙 郑之徒

傅永锡 鲁应生 唐永泽

肖理明 殷林昌 黄大彰

二、屈原故里第一个农民诗社——骚坛

附：骚坛社员诗词选辑

.....王建强 记录整辑

三、日寇侵华罪行之一斑

敌机轰炸秭归县情况

.....县志办公室

秭归民生工厂始末

秭归民生工厂是解放前秭归唯一的一家综合性企业。

该厂创建于一九四二年春。创建之初，虽挂着“秭归民生工厂”的牌子，实仅只由私营的“黄彬昌印刷馆”扩建而成的“秭归印刷所”。是年夏季，始增设造纸部、面粉部。至一九四四年上半年，乃成立“秭归民生工厂总部”，再增设煤炭部、纺织部，将印刷所改为印刷部，于是民生工厂方成为下设五部的综合企业。

秭归民生工厂曾有一段较为兴旺发达的日子，但好景不长，几个部或因管理不善而夭折，或因技术落后而昙花一现，即使寿命最长

的印刷部待至解放前夕也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幸逢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始获得发展向上的旺盛的生命力。

历史是一面镜子。秭归民生工厂的兴衰、始末，固然可以使我们具体地认识到在国破民穷封建社会里兴办实业，振兴经济谈何容易！就是在另些方面，诸如企业管理，技术革新等也是非常困难的。正如唐太宗曾说过的“……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

这正是我们编印秭归民生工厂史的缘由之

一。

对秭归印刷所 及秭归民生工厂 印刷部的回忆

胡立珍、陈明龙、郑之徒等口述

黄大彰记录整理

黄文波原在龙王庙私人经营“黄彬昌石印馆”。一九四二年农历二月中旬的一天，县长杨干召见黄文波，说准备将“黄彬昌石印馆”扩建为“秭归印刷所”，挂“秭归民生工厂”的牌子，黄文波表示同意。杨干遂当面封黄文波为经理，（后秭归县政府下达委任状时，因嫌“所”的规模小，改任黄文波为印刷所主任。）并指定教场坝铁佛寺为秭归印刷所的厂

址。

黄文波怀着受宠若惊的无限喜悦当即返回石印馆，向全体职工传达了杨干的旨意，并号召师傅们抓紧石印馆的结束工作，争取早日办理移接交手续。不几天，就结束了原石印馆的印件并搞好了机械、工具及人员的登记造册。

一九四二年二月中旬末，黄文波偕同原石印馆全体人员——石印师傅聂运春、刘其祥、刘其钧、杜云光，学徒聂昌福、聂昌茂，装订师傅李家斌、黄大彰等将全部生产资料——石印机五部（其中木制机二部），装订工具一套和其他生产工具全部搬迁到新址并安排就绪。

一九四二年农历三月初八，是秭归印刷所开业的日子。这天，铁佛寺内张灯结彩。早饭后，县长杨干率领县政府各科局长及随从人员来到铁佛寺，并由俩人抬来素罗的“秭归民生工厂”巨大横幅。横幅上装饰着用红绸做的花

束。在鞭炮齐鸣、锣鼓喧天的一片喧嚣声中，横幅挂上了铁佛寺大门上端。“秭归民生工厂”（实际是秭归民生工厂印刷所）宣告正式成立。

此后，相继由县政府下达委任状，调任配备了管理人员：黄文波为印刷所主任，鲁相之任事务员，余从宽为营业员，温泮青为会计员，郑叙之为书记员（负责石印誊写工作），蔡华春负责总务保管工作，徐汉堂为炊事员。

印刷所下设有厂办公室，印刷小组，装订小组，门市部等；制定有企业管理方案和基层班组生产定额。

印刷小组的人员分工为：石印技师杜云光、聂运春（不久，聂运春回宜昌，带走他的侄儿聂昌福、聂昌茂）；印刷员王光清、聂厚明、胡振凤、向培湘；学徒谢宗植、赵士贤、曾家财、彭恢家、陈明龙、董大忠。

装订小组的人员分工为：技师宋宏修、黄大彰；装订员彭洪德；实习生郑全友；学徒郑之徒、张选林。

生产管理技术定额为：石印每日八开手刷六百份，手摇石印机日定额五百张，木刻印刷日产量为五百份（帐单、十行纸）；装订工日定额为：搓捻子一小时五百根，表刷壳子（单元纸）日三刀（九十六张为一刀），做信封（二十开）每人每天一刀壳子（两至三层）即做信封一千二百个，抽页子日六千份，清数日产量为八千份。

印刷的业务范围为：县政府各科室办公所需印刷品及公文纸，会计帐单凭证，学校学生课本、作业本等。生产的成品交门市部销售。

当时，民生工厂（印刷所）的企业管理办法中规定有严格的等级制度，企图以此调动职员、工人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发展。共分四个

等级：一、技师；二、印刷员（装订员）；三、实习生；四、学徒。

经济待遇也按等级区分：主任月薪四市石谷（按当时物价折款发给），一般职员月薪两市石谷，技师每月四千元纸币，装订员、印刷员每月三千元纸币，实习生每月二千元，学徒除吃饭不要钱外，每月只发给全所职工都有的一千元，（类似现在的洗理费）。但实习生和学徒不发给货币，只发白纸条子，多不能兑现，即使兑现了，学徒工的月薪一千元的价格，只能供三、五人吃一次油条。

全所职工的口粮都是县政府拨给的，但饭食也依等级而异。职员每餐四菜一汤，高桌子低板凳，一月一次牙祭，吃粮不定量；吃饭时，还有轮流值日的学徒立于桌旁给添饭。工人虽然每餐也是四菜一汤，但没有桌凳，而是以地为席，并且吃粮定量，每人每天一斤（县

政府按每人每月四十五斤拨给)，吃超不补。为避免争饭，由装订员彭洪德掌瓢分饭。工人吃不饱，有怨言，装订技师宋宏修写了一幅横幅张贴于车间，想以此消除怨言。横幅上写的是：“食勿求饱，技术必须精益求精”。

不仅如此，饭食的等级还表现在另一方面：若田粮处拨给的是苞谷，推磨是工人学徒们的事，职员不仅不推磨，而且筛子下的细面归职员吃，筛子上的粗面脚壳则是工人学徒的饭食。

工人上班时间长。每天清早六点上班，至下午八时许才下班（中餐、晚餐后只各歇息一小会儿）。每天工作时间长达十三小时，工人疲惫不堪。印刷所用油墨，系黄文波用松烟、桐油、黄腊、羊油作原料自制的；照明用的是桐油灯，印刷所工人总是满身乌黑，只见两只眼在眨动，酷似挖煤的一样，所以老百姓称印刷

所工人谓“黑娃子”。

工人们特别是学徒们忍受不了种种折磨，便三三两两地窃窃私语，有的还想逃跑。装订技师宋宏修站在官府一边威吓工人说：“要得辛寒脱，除非进木壳”（编者注：辛寒，方言，意为灾难。木壳，即棺材）。他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作的。工人胡立珍，香溪胡家坪人，在印刷所生病，由于无钱医治拖成了慢脾寒，只有请假回家治病。病还未好，厂里三番五次催促他回厂上班，胡立珍只得带病返厂。厂方不仅不给予照顾，反而将胡禁闭三日，说什么“久假不归，有碍厂规，关押三日，以警效尤”。

“黄彬昌印刷馆”改为“秭归印刷所”后不久，先后办起了秭归民生工厂造纸部、面粉部。

一九四四年上半年，县长杨干认为印刷

所、造纸部、面粉部创办以来，培养了一批技术人员，并认为有利可图，于是召见王永和（大地主，原任居隐乡乡长）、郭明轩（地主兼工商业）、唐永治（茅坪粮绅），商议秭归民生工厂扩建计划，确定成立民生工厂总部，下设印刷、煤炭、纺织、造纸、面粉五个部，王永和任总经理兼印刷部主任，郭明轩为副经理兼煤炭部主任，唐永治任造纸部主任，黎开启任面粉部主任，纺织部主任暂缺，因该部设在总部一起，故由王永和代管。杨干等人还决定从原印刷所分拨部分人员和生产资料在茅坪徐家湾设一分部。

在这之前，印刷所部分工人、职员曾检举黄文波、蔡华春贪污钱财，因此这次扩建计划会议，黄文波未参加。

会后不久的一天，县长杨干、县参议长林智伯、县参议会事务秘书黄汉村、县政府建设

科长肖恢儒、民生工厂总部管理员姜焕臣等一同到了印刷所，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在会上，杨干破口大骂黄文波、蔡华春，斥责他们胆大妄为，贪赃枉法，吞食印刷所钱财；当众宣布撤销黄文波、蔡华春两人原职务，限期退赃；然后宣布派黄蔡二人前往茅坪印刷分部，负责分部工作。同时宣布：郑叙之、郑家瑗调任县党部文书，印刷部只留用营业员余从宽、事务员鲁相之、技师杜云光，其余人员听候调任。

一九四四年六月，黄文波（分部主任）、蔡华春（分部副主任）、事务员徐涵若、营业员胡义臣、会计龙阳春、书记员郑杰三、炊事员蔡茂春等到了茅坪，开始了分部的筹建。黄文波随即去宜昌县请来了朱平成师傅，购回了两部圆盘机。稍后，分部增添了部分人员，计有印刷工人何兴正，铅印学徒谢克诚、朱运春，

刻字技工王寿伯，排字工吴元友，石印员韩启年（现名胡振凤），装订技师高秉基，装订员胡立珍，装订学徒谢宗植、肖方奎等。

是年夏季，茅坪发生瘟疫，装订学徒谢宗植患痢疾，无医无药，又无人照管，病情日益加重，副主任蔡华春强行叫人将谢宗植抬到屋后阴沟内放着，致使谢的两腿被蚊虫叮咬聚成毒疮，腐烂生蛆。不久，谢宗植病饿死于屋后阴沟内，分部仅通知家属领尸了事。接着，肖方奎身患疟疾，高烧不止，不几天死去。同时，炊事员蔡茂春病倒，分部将其送回总部，王永和怕传染他人，派人把蔡茂春抬放于教场坝一个防空洞内，不几天也死于病饿交加。由此，分部职工感到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纷纷要求从茅坪撤回，黄文波只得写报告给总部，总部同意撤回。分部撤回了，黄文波、蔡华春也就此下台了。

一九四四年十月，印刷部因厂房不够用，报县批准迁至大慈寺，遂与纺织部合并，但生产仍分为两个车间，朱平成负责印刷车间，肖理明负责纺织车间。

不久，工人胡立苍、聂厚明、谢克诚、郑之徒等四人，因感到民生工厂的职员、工人待遇不平等，工资不兑现，生灾害病无医无药，家中老小生活无着落，遂结伙逃跑至巴东去投奔原在秭归民生工厂印刷部当过工人的何兴正、俞华轩。他们到何兴正家刚吃完一碗面条，主任朱平成和高秉基就赶到了巴东，将四人“劝说”回来。当时，王永和因办厂不力刚受了县长杨干的严厉训斥，他无心顾及胡立苍等逃跑之事，因而四名逃跑者才幸免惩处。

同年十二月，县参议会全会期间，印刷部工人赵士贤、徐先林、郑之徒、陈明龙等，为了维护工人利益挺身而出，将供职员吃的筛子

下的细面和供工人吃的筛子上的粗面脚壳各包了一包，高举着穿过大街闯进县参议会，向参加参议会全会的所有参议员控诉厂、部剥削、虐待工人的罪恶行径。这一行动，震惊了议长林智伯、县长杨干等。为了缓和矛盾，杨干当即离席接见了工人们，听取了他们的控诉，声称此事一定查处、追咎责任，然后劝说工人们回厂生产。

第三天，杨干率领警卫人员来到总部，叫出管理员姜焕臣、事务员向立勋，严厉训斥一番后，各打了姜、向几马鞭子，并责令今后不准虐待工人，职员工人吃粮一样，每月给工人打两次牙祭，尔后把朱平成、肖理明两个主任叫到身边吩咐说：“你们要关心工人，要多教技术，不准打骂工人”。

发生这件事时，王永和不在厂，第二天他回厂听说这件事后，暴跳如雷，声嘶力竭地叫

喊要追查闹事者，但又慑于县长杨干有吩咐，只得照办，于是他集合印刷、纺织两车间全体工人说：“大家知道，每月吃两次肉，哪里弄来钱呢？杨县长信口开河，真是谈何容易！还是要大家努力搞好生产才能过好日子呀！”王永和为了缓和矛盾，表示慷慨，当众说：“明天叫人去我家里提几块腊肉来，给大家改善生活。”王永和说得如此大方，但实际上工人到口的也只是每人二两许，并发生了为争肉吃打架的丑事。

两个工人为争肉吃打架了，王永和挖苦工人们说：“你们太不自爱了！把肉你们吃，你们还争得打架！”印刷车间主任在一气之下，将打架的两个工人各打了四扁担。

一九四六年春，民生工厂总经理王永和调国民党秭归县党部任职，原副经理兼煤炭部主任郭明轩提升为总经理。郭上任时大摆阔气，

自带厨师，杀猪宰羊，停产三日，宴请党、政、军各界要人及地方有名气的士绅，耗了不少资财。

一九四六年秋，原为躲兵伏粮款而来的纺织部工人四散回家，接着，纺织车间又因织出的布销售不出等原因被迫停产，印刷部有些工人也趁机另找门路了。此时，印刷部奉命迁至南门外水佛寺。不久，杨干调走，新上任的县长高云安视察时认为水佛寺不象厂房，要印刷部搬到城内彭香全住宅（现工业局的原址），并委派王沛卿为经理。王沛卿年老多病，任职不久即告老还乡，高云安另派陶远仁（高云安上任时带来的）为经理，免去原印刷车间主任朱平成的职务。

陶远仁在业务上是外行，在生活上一味追求吃喝并酷爱打牌，但他对工人监督得很严。

他上任后，，强令工人胡立珍、胡兴银日日夜夜加班加点赶印兴山县田粮处的钱粮票